

技术批判的数字时代转向：从马尔库塞到祖博夫

陈奥宁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4月19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13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22日

摘要

祖博夫的“监控资本主义”理论与马尔库塞批判理论之间的延续与发展关系逐渐有学者展开研究。祖博夫在批判对象方面，其批判逻辑始终围绕人的物化展开阐述，但相对于马尔库塞“无形”的理性批判，她将批判对象对准“有形”的数据，通过提出行为剩余、行为预测、行为修正等概念来反思数字资本主义；在分析方法上，祖博夫始终都与马尔库塞一样反对技术中立，并相对于马尔库塞的存在论批判，她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权力形态的分析中，二者都承认支配的普遍化，认为人在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控制的技术下“单向度”程度不断加深，祖博夫的理论剖析了权力形态从规训到控制的转变。祖博夫在反思和批判中修正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理论中的许多不足和局限性，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超越，但两者同样所带有的悲观主义色彩以及批判的不彻底性导致祖博夫仍然未能克服西方批判理论的固有缺陷，在出路的探寻上仍是失败的。

关键词

马尔库塞，技术理性，祖博夫，监控资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

The Digital Turn in the Critique of Technology: From Marcuse to Zuboff

Aoning Chen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19, 2026; accepted: May 13, 2026; published: May 22, 2026

Abstract

Scholars have gradually begun to explore the continuity and develop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Zuboff's theory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Marcuse's critical theory. In terms of the object of

critique, Zuboff's critical logic consistently revolves around the reification of human beings. However, in contrast to Marcuse's critique of the "invisible" reason, she directs her critique at the "visible" data, reflecting on digital capitalism by proposing concepts such as behavioral surplus, behavior prediction, and behavior modification. In terms of analytical method, Zuboff, like Marcuse, rejects 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and relative to Marcuse's ontological critique, she shifts toward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analysis of power forms, both acknowledge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domination, arguing that human beings are increasingly deepening in their "one-dimensionality" under the constantly developing technology of capitalist control. Zuboff's theory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wer forms from discipline to control. Zuboff revises many of the shortcomings and limitations of Marcuse's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through her reflection and critique, achieving a certain degree of transcendence. However, the pessimism and incomplete critique inherent in both theories mean that Zuboff remains unable to overcome the inherent defects of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and thus her search for a way out still ends in failure.

Keywords

Marcuse,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Zubof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技术哲学的讨论中,肖莎娜·祖博夫于2015年首次正式提出“监控资本主义”概念,认为人类的私人经验被监控资本主义转化为行为数据的免费原料,且通过将行为数据制作成“预测产品”,对人类未来的行为进行预测和调控并不断威胁着自由及隐私[1],这一概念已成为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范畴。针对这一批判理论范式,丹尼尔·伊比(Daniel IBI) [2]以及努诺·奥利维拉(Nuno Oliveira)等学者认为其与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之间存在继承性与延续性[3],但仅围绕技术支配思想以及行为预测与“单向度”概念之间的比较等展开,未能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对这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本文将分析祖博夫对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继承和超越,进而探讨当代西方批判理论在数字时代的转向。

2. 批判对象的转向:从技术理性到数据理性

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技术理性批判学者所面对的是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后的发达工业社会及福利国家,而以祖博夫为代表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学者所面对的信息革命后的新工业社会及平台资本主义,在这种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中,技术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更加隐蔽,但其强度却因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史无前例的增强,因此,以祖博夫为代表的当代批判家将自己的批判对象从抽象的技术理性转变为更具体的数据理性。这种转变并非是对技术理性批判的否定,也不单纯是技术理性批判的当代应用,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展开而对技术理性批判的更深入的认识。

马尔库塞在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思想、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海德格尔的“座架”概念以及霍克海默的理性观点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发掘出科学技术作为统治工具的支配作用,形成了其技术理性批判思想[4]。马尔库塞认为,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理性的极度发展并未带给人类解放,反而通过提供舒适生活和文化工业,将统治内化为人的心理结构,“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5]。他认为技术理性已成为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它弥漫在思维、语言乃至闲暇时间中,将现状合理化,

并因此消解了否定性思维[5]。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概念是超感性的，其指向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思维方式受技术理性统治的状况。

自上世纪90年代福利国家模式走向衰退以来，人们被迫走出原本的舒适生活，面临着文化工业日益加剧的标准化与商品化进程，个体的困境不再表现为马尔库塞所描述的那样，人们对自身被奴役状态的无意识[5]，而是在数据和算法的支配下即使意识到这种处境，也难以进行有效反抗。祖博夫则进入感性的层面以马克思的劳动监督理论以及以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等西方经典监控理论为理论基础[6]，从普遍信息化和平台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中发现并系统描述了资本主义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更为剧烈而隐蔽的压迫和权利剥夺[7]，祖博夫认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通过平台提取和利用人的行为剩余，预测以及修正人的行为，将人们困在新的数字牢笼中进行剥削和掠夺，人们不仅丧失了否定理性，也丧失了行为自由[8]。祖博夫等批判者关注的核心不再是无形的理性，而是有形的数据与算法，这种转向可以被视为对马尔库塞式宏大叙事的修正，它将批判从哲学思辨拉回到具体政治经济学分析。

虽然祖博夫的批判理论看似与马尔库塞构成断裂，但如果我们把批判理论的发展史看作是针对资本主义物化状况变化的理论更新，那么从技术理性批判到数据理性批判，本质上是对人的经验如何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系统性占有这一过程的揭露。马尔库塞所在时代的物化，主要表现为人的主体性被消费社会所塑造的虚假需求同化；祖博夫面对的数字时代物化则表现为人的每一个行为、每一次点击都被转化为数据原料。因此，祖博夫并非抛弃了马尔库塞的批判逻辑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的最新动态对批判理论进行了发展。这一发展在思想史上首先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开启，他最先借鉴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分析社交媒体如何通过算法、数据剥削和意识形态操作强化一种“单向度”及否定维度丧失的行为模式，之后祖博夫将其发展为以行为修正与预测性制造为核心的“单向度”及自主维度丧失的行为模式[9]。祖博夫并没有否定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理性具有统治性质的论断，而是要求将批判重心从抽象的思维统治收回到具体的现实控制中来，在祖博夫看来，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不再是一种支配性的思维方式，而更多是具体的代码和算法通过诱导和修正人的行为，所实现的严密的资本主义控制。因此，将技术理性对单向度的人的统治批判发展为数据理性对人的行为预测批判，是批判理论对物化的根本关切的延续。

马尔库塞由于身处阶级斗争陷入低潮的福利国家，工人收入稳定并对未来持相对乐观态度，其反抗意识被大量福利制度消解，因此，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寄希望于通过文化批判再次激发工人的反抗意识，同时也落入了“把造成人的非人化的根源不是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10]的问题。马尔库塞在批判技术理性的极权主义时，往往容易陷入一种对技术本身的抽象否定，而缺乏对技术如何具体嵌入资本积累过程的历史性分析，从而把批判重点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与心理层面，弱化了政治经济学分析，这也是造成理论批判不够深入的主要原因[11]。而在福利国家消退的数字时代，工人虽然有反抗意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高度完善、即使人们意识到压迫也难以走出系统的社会，“民众半推半就、感到无助和绝望，慢慢对这种侵入手法感到习惯”[8]。因此，祖博夫批判的转变是将现实性考量注入技术理性批判，回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搁置的政治经济批判，是对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在数字时代的延续与深化。

3. 分析方法的嬗变：从意识形态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由于批判对象从技术理性转向了数据理性，批判理论家分析的方法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从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转向了祖博夫的政治经济分析。马尔库塞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文化工业的各类产品展开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12]，旨在揭示技术理性如何压抑了人的爱欲，以及其如何通过额外压抑来维持社会稳定[13]。然而，这种分析方法在应对数字资本主义时显得力不从心，因为数字时代的剥削不再依赖于意识形态的遮蔽，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数据暴力，造就了更具掠夺性的经济积累模

式，“大数据的有效利用将实现经济转型，并带来生产力增长和消费盈余的新浪潮”[14]。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采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了数字平台的资产结构、利润模式和劳动组织等，提出平台垄断理论，他认为平台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础设施压缩了工人的反抗空间，使得资产阶级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控制就可以对工人实施奴役，实现快速的经济积累[15]。而祖博夫在斯尔尼塞克的研究基础之上，同样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通过大量的制度分析、法律研究和商业案例整合等将监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制度来解剖，分析了监控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平台将行为剩余转化为新的原始商品。

尽管方法论发生了转变，但在技术非中立这一核心观点上，二者是一脉相承的。马尔库塞在哲学层面论证了技术并非中立工具，其支撑着特定的社会控制形式；祖博夫则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进一步地说明了一点。他们共同揭示了技术如何作为一种权力生产机制而存在，而技术不仅再生产了生产关系，更直接创造了新的资本积累形式和剥削形式。这种发展的关系还体现在对系统封闭性的揭示上。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能够不断吸纳反抗的封闭体系，祖博夫则展示了监控资本主义系统如何通过机器学习形成一种无需共谋的默契，任何形式的反抗本身都可以作为一种数据被用来强化系统的预测和控制行为[8]。两者方法虽然有差异，但剖析权力系统如何通过技术实现自我强化的核心任务没有变。

这种方法论的转变似乎倒退回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批判方式，摒弃了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创出来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批判的向度，这是否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呢？恰恰相反，这是根据批判对象的变化而发生的分析方法的转换，而且它并非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当中的技术中立论。由于马尔库塞“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历史与辩证的眼光”[10]，因此在面对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的这一最新变化时，其批判理论无法对最新现实展开一种有力的批判。工业资本主义将自然作为其疆域，把物质世界转化为生产、消费和废弃的手段，对于这一状况马尔库塞的批判是有效的，但是面对监控资本主义将人类经验作为其免费的原材料，把日常生活中无形、未加利用的残余转化为行为数据——这是机器智能的新“食粮”[8]，马尔库塞的批判就显得有所局限，而祖博夫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她将数字技术置于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历史演变中考察，揭示了从工业资本到数字资本的内在逻辑演变。

然而，然而祖博夫的批判方式的确有走向实证主义的风险。例如朱莉·科恩(Julie Cohen)批评祖博夫的观点过于狭隘，过分聚焦技术对自治的威胁，从而遮蔽了更广泛的结构性与政治经济结构[16]。本·李(Ben Lee)也批评祖博夫过于聚焦技术，从而弱化了对资本积累逻辑、阶级结构与政治斗争的分析，认为其带有技术精英与制度修补的倾向[17]。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数据化，把人的全部经验都变成了可开采的内部资源，消解了马尔库塞的想象力植根所在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外部，也就是未被完全整合的工人阶级、艺术审美领域以及大拒绝的乌托邦潜能[9]。尽管祖博夫全面剖析了当前资本主义系统的运作机制，但其确实因为存在上述批评者所指出这些缺陷，而在解放路径方面存在短板。当然这并非是理论上的退步，而是在面对更加复杂的控制形式时，当下批判理论所共同面临的历史性挑战。

4. 权力形态的转变：从“规训”到“控制”

随着批判对象的物质化和分析方法的实证化，祖博夫通过运用福柯、德勒兹等法国理论学家的微观权力学说对数字时代的权力进行分析，从而使得技术批判对权力形态的研究范式发生了从“规训”到“控制”的转向[18]。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理性支撑下的权力主要表现为一种压抑性理性或塑造性权力，主要凭借的并非暴力禁止，而是通过塑造主体的需求、感性与思维方式来运作[13]。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理性创造了舒适的不自由，让人通过认同消费系统来认同统治，这是一种深层的心理学权力，它让人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时，不知不觉丧失了批判能力[19]。人们或许可以通过知识的武装来识破意识形态机器的控制，并采取一定的反抗措施。但祖博夫指出，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平台作为一种架构，不仅规定了用户能做什么，更规定了用户能看到什么以及能以何种方式互动[20]，从而实现了对人的完全控

制，不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和直接暴力对人进行“规训”，就能够实现对人精确的控制。监控资本主义的核心已不在于让人做什么，而在于准确预测每个人将要做什么，并在此刻介入诱导、矫正人去做什么，这是一种超越用户个人意图的权力。在这种权力体系中，恰恰与马尔库塞时代相反，人们不再被意识形态蒙蔽，人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被系统监控，以及控制和预测行为，却仍然无能为力。在祖博夫看来，反抗不仅在意识层面，甚至在生理反射层面都被预判与化解了，并且用户大多即使已经意识到自己当下的处境，却“只是眼睁睁看着自己滑向深渊而毫无选择”[21]。总之，从想要揭示一种资本主义现状的结果层面来看，祖博夫认为资本主义系统的统治方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心理学和美学维度的意识形态控制，而是高度工具化的行为管理与数据运算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她证实了马尔库塞所提出的单向度进程如何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被推进一个更趋完美和冷漠的阶段。

虽然权力形态发生了变化，但两者都承认支配的普遍化，并且祖博夫对这一支配的不可违抗性有着更悲观的预期。马尔库塞担心人会被整合进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系统中，而祖博夫告诉我们这一整合已经在数字时代完成了，人不再只是系统的一部分，人的每一个细微行为都变成了系统的“燃料”[8]。另外，这种理论上的连续性还体现在对资本主义消除无产阶级反抗的揭示上，不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控制并塑造个体，还是在生理层面进行控制和预测，两者都揭示了随着资本主义权力系统的愈发完善，无产阶级的反抗就被消解得越来越彻底。

尽管祖博夫的批判理论通过分析权力如何透过微观的日常生活而被生产，显得更加动态精准且与资本积累直接勾连，但祖博夫对心理学和美学维度分析的放弃，使得其理论失去了由马尔库塞所发展出的美学批判路向，忽视了权力对人心灵和感受层面的深层扭曲。而在数字时代，数据和算法对人心灵实现了更深的控制，马尔库塞的理论在今天依然有解释力。当代有学者已经开始探索监控资本主义美学，如艾米莉·罗莎蒙德(Emily Rosamond)认为，监控资本主义美学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并探索了，在行为被持续测量和金融化的条件下，尽管“监控”字面意为“监视”，但在监控资本主义中，用户数据往往直接被算法操作化，而从未被真正“看见”，“感性既具有后果性又无关紧要，艺术作品和文化实践需要回应这种高度可见的主体与极其排他性的解释手段之间的矛盾体”[22]，因此这种可见性与不可见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祖博夫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构建监控资本主义概念，给予数字资本主义批判更多元的批判视角，并在综合资本主义控制与权力体系的分析中，以行为预测与修正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概念推到极致，构建了一种紧密贴合当下资本主义现状的批判理论。从批判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来看，祖博夫可以说是超越了马尔库塞。但祖博夫的理论在解放路径的探索上仍然有空想性质，她认为监控资本主义企业与受众之间有机互惠的缺乏是造成当今困境的条件之一[8]，从而寄希望于监控资本家将供给与需求曲线导向预测人口、群体和个人行为的企业[23]，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并未由监控数据商品化过程上升到生产劳动的本质维度，从而难以找到监控资本主义“总问题”的根源，自然也与真正的革命主体失之交臂[24]，因而其所提出的“共产主义互联网”方案也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根基，只是隔靴搔痒。另外，祖博夫的监控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悲观主义的，认为“个体的物质构成了监控资本主义这台巨大机器运转的燃料”，“将我们都视为‘监视资本家’操纵下无力抵抗的受害者”[3]，这样一种认为任何抵抗都会被系统消解的论断，似乎说明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很难找到出路。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工人一方面是数字平台的受压迫者，同时也是数字产品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在数字平台发展其对工人的奴役的同时，工人也在这一过程中展开了更广泛的联合，具备了更全面的数字知识与能力，打破系统的条件就蕴藏在监控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之中[3]。因此打破系统并不是空想，解放的路径就在监控资本主义内部，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其发展自身的同时就积累着内部的不自治，这将使得最终无产阶级推翻整个制度体系并且实现解放。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5年新疆大学研究生智慧课程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编号:XJDX2025YAIK0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Zuboff, S. (2015) Big Oth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0**, 75-89. <https://doi.org/10.1057/jit.2015.5>
- [2] IBl, D. (2023) Critique of One-Dimensional Thought Then and Now. Confronting Two Critiques of Ideology through a Longer View of Capitalist Platformization. *Sociologia Della Comunicazione*, **34**, 90-108. <https://doi.org/10.3280/sc2023-065006>
- [3] Oliveira, N. (2024) Digital Capitalism, Subjectivation... and the End of Resistance? *A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1**, 86-102. <https://doi.org/10.17161/aion.v1i1.22482>
- [4] 张成岗. 从意识形态批判到“后技术理性”建构——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理论的现代性诠释[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0, 26(7): 43-48.
- [5]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6] 冯旺舟, 张宇捷. 21世纪监控资本主义研究述评[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6(1): 120-128.
- [7] Cohen, J.E. (2019) Review of Zuboff's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Surveillance & Society*, **17**, 240-245. <https://doi.org/10.24908/ss.v17i1/2.13144>
- [8] [美]肖莎娜·祖博夫. 监控资本主义时代: 在权力的新边界为人类未来战斗》[M]. 温泽元, 林怡婷, 陈思颖, 译.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 [9] Fuchs, C. (2016) Herbert Marcuse and Social Media. In: *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New Readings of Lukács, Adorno, Marcuse, Honneth and Haberma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111-152.
- [10] 赵建军. 超越“技术理性批判”[J]. 哲学研究, 2006(5): 107-113.
- [11] 王强, 王岩. 马尔库塞“单向度控制”思想再审视[J]. 山东社会科学, 2024(11): 60-67.
- [12] 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246.
- [1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 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M]. 黄勇, 薛民,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35-38.
- [14] Manyika, J., Chui, M., Brown, B., et al. (2011)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 [15] [加]尼克·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M]. 程水英,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 [16] Cohen, J.E. (2020) The Law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Yale Law Journal Forum*. https://yalelawjournal.org/pdf/KapczynskiBookReview_iqh4qxtw.pdf
- [17] Lee, B. (2021) Putting the ‘Capitalism’ in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Current Affairs*. <https://www.currentaffairs.org/news/2021/05/putting-the-capitalism-in-surveillance-capitalism>
- [18] Zuboff, S. (2020) You Are Now Remotely Controlled. *New York Times*.
- [19] Marcuse, H. (2020) Liberation from the Affluent Society. In: Bronner, S.E. and Kellner, D.M., Eds.,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Routledge, 276-287. <https://doi.org/10.4324/9781003059509-29>
- [20] 朱嘉玉. 平台、数据与劳动: 社交媒体时代的技术封建主义[J]. 求索, 2026(1): 188-195.
- [21] Sartre, J.-P. (1993) Being and Nothingness: An Essay on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 Hazel E. Barnes.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 [22] Rosamond, E. (2018) Surveillance Capitalist Aesthetics. 31-35. <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paper/Surveillance-Capitalist-Aesthetics-Rosamond/fd40ea3714023a3d23cb68ef189ae8089df7a812>
- [23] [美]肖莎娜·祖博夫. 监控资本主义与集体行动的挑战[M].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23(5): 83-99.
- [24] 田方晨, 刘明明. “监控资本主义”理论评析[J]. 社会主义研究, 2024(6): 46-54.